1999年第6期
第36卷
(总196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 1999
General No. 196
Vol. 36

从"支那"到"西洋"的转折点

——试论日本近世思想家本多利明

王　青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本多利明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颇具特色的经世学家, 他以独特的风土史观为依据, 力说日本应摆脱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努力接受西洋的文明成果。他的具有近代合理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主张, 使日本学术界将他尊为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先驱。但是利明极具近代特色的经世主张实际上仍与传统儒学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 利明面对西洋文明的挑战, 以独自的方式完成了从中国文化到西洋文化的价值转向过程, 而这也正是日本社会从中国文化到西洋文化的价值转向的写照。

关键词: 兰学; 儒学; 重商主义; 海国

中图分类号: I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1999)06-0108-08

一、本多利明的经世论

本多利明(1743—1820, 日本宽保三年—文政三年)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后期的经世学家, 出生于越后蒲原郡(今为日本新潟县村上), 在江户(今为日本东京市)学习关孝和[1] 流派的算学和天文历学, 后来他在江户开设私塾, 教授的也是算学和天文学。这表明他的学问内容已经摆脱了以习字和讲解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 而偏重于自然科学的方面。利明从关孝和流派的数理学、天文历学入门, 通过汉译洋书, 逐渐接触并接受了西洋的天文、测量、地理知识, 被现代日本史研究学者归为兰学家一类。

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 利明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自然经济开始崩溃, 造成了幕府和诸藩的财政困难, 武士和农民日益困穷, 而城市大商人日益发达, 再加上相继而来的大火、瘟疫、饥馑和农民的暴力反抗, 大大地动摇了江户幕府的封建统治。利明曾前往福山、奥羽、常陆地方进行视察民情的旅行, 他描述所看到的景象是武士都迫不得已向商人借钱, 以至受制于商人, 为了摆脱财政困难, 诸侯有司一味盘剥百姓, 此时如果再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 对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天明大饥馑(1783—1788)时, 仅奥州一地就饿死数十万人之多, 再加上溺婴恶俗, 使农民人口不断减少, 甚至有断绝之势。

深刻的危机不仅表现为日本社会内部的武士和农民的贫困, 俄国在日本海领域频繁的出没和南下同时带

收稿日期: 1999-09-03

作者简介: 王青(1964—　), 女, 北京人,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1] 关孝和(?　—1708):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数学家, 著有《大成算经》、《括要算法》、《发微算法》等, 对日本数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来了来自西洋的外压，当时的经世家们都面临着内政外交两个难题。在这一时代课题面前，各个流派的思想家作出了各种回答，利明也奋笔写下《经世秘策》、《交易论》、《长器论》等多篇政治经济论著，从科学技术、经世论、北方问题这三个方面详细展开了他的具有近代合理主义和实学倾向的经世论。

德川幕府开国时把重视身份秩序的朱子学奉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以为自己的政权寻找正当化的理由。但是随着朱子学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和发展，由于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朱子学的教义与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抵牾。为了解决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一些日本儒学家从各种角度对朱子学进行了重新解释，甚至不乏批判和歪曲，在正统的朱子学之外，还相继形成了古学派、阳明学派、折中学派等。

另一方面，江户时代日本虽然执行了锁国政策，但与清朝和荷兰的贸易活动是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的。随着与荷兰的商业往来，荷兰语书籍也流传到日本，为日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1720 年(日本享保五年)德川将军吉宗宣布洋书解禁，从此大量的荷兰语书籍得到翻译，内容涉及医学、数学、兵学、天文学、化学等方面，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兰学家，他们在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等领域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传统朱子学的道德“合理主义”受到了西洋近代的科学合理主义的严重挑战。

利明在思想方法上受古学[1]派影响，同时在学问内容上很大程度地倾向于兰学。他出生时兰书译读已经解禁，虽然他的荷兰语能力似乎并不高，不过他的友人司马江汉(1738—1818)是当时著名的西洋地理学者和出色的荷兰语翻译家，利明还与其他一些兰学家有来往，并受到兰学的很大影响。在他的著作中，频繁引用西洋学者和执政者的名字，但对于本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利明经世论的出发点是他认为万民增殖的趋势是“天理”，而根源在于“夫妇”，这是“人伦五常”，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所以是“国之本”。关于婚姻形态，利明说“西域(指西洋——著者注)制度，虽王侯以有本妻而使妾为第一耻辱”[1](下卷 P146)，他针对封建伦理，肯定基督教的一夫一妇制度。他推算出两对夫妇三十三年间可以生 79 个孩子，人口增长率是十九倍九分五厘，而解决势必日益庞大起来的人口的生存问题的方法论就是“自然治道”。

利明认为为了保障万民增殖，就必须实现国产的增殖，而国产有限，国民无限，所以为了弥补本国国产的不足，就必须吸收他国的力量，吸引他国的金银，以壮大自己，因此“交易”——商业贸易活动就是必不可少的。他曾多次进行社会调查，“余巡视诸国者三次，身固贫，或时卧于野，卧于山，身积难仪困穷”。他历尽艰辛考察的结果是发现“诸国农民稼穑之道，或因运送不便利，其国其处自腐之国产”[2](下卷 P28)无法进行交易，由于商品不能流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农民的严重贫困，而这正是社会动荡和衰弱的根本原因。“遣船舶之万国，取国用要用之产物及金银铜输入日本，厚国力，此乃海国具足之方法。仅以自国力而治，则国力渐弱，其弱皆转嫁于农民，农民连年耗减者自然之势也。”[2](下卷 P32)

因此只有发展商品经济——交易，才能取长补短，遏止财富的生产者——农民人口减少的趋势，使日本富裕强大起来。“万民增殖之势，国君大加誉悦，扶所短，赏所长，万民增殖之势不蹇，开业所望终悉成就，国家丰饶刚健，挟武国之名，邻国威服，将成日本属岛。”[2](下卷 P22)

对海国日本来说，交易首先以海洋涉渡为条件，“日本乃海国，渡海、运送、交易固国君天职最第一之国务”[2](下卷 P32)，航海需要运用天文地理学来确定船舶方位，而算学又是天文地理学的基础，所以利明认为算学、天文地理学、航海学就是经世论的学问基础。

利明的经世主张除了上述交易论之外，还有一个“属岛之开业”，即殖民地经营论。由于这个问题在当时涉及到国际关系等政治问题，比较敏感，利明谨慎地不肯深谈，但他无疑是把建立殖民地也作为了日本强国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殖民与贸易的成功的楷模当然就是法兰西、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当时欧洲的富强国家，“故云天下万国之国

---

[1] 古学：江户时代针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主观道德主义倾向，山鹿素行提出了摒弃宋儒对经书的以阐发义理为主的解释方法，直接从儒学经典中发掘孔孟之道的含义和本质的学术主张。后来经过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的继承和发展，古学派蔚为大观，风行一时。

产• 宝货皆群集欧罗巴, 若云如何天下万国之国产• 宝货皆群集欧罗巴, 则彼以船舶出至万国, 以己国珍产• 良器、种种机巧之物, 与诸国金银铜、其余长器• 良产交易, 输入己国, 故渐为丰饶。丰饶故刚强, 国强故无外国侵掠之事, 自彼国侵掠万国之内者不知其数。——天下无敌国为欧罗巴也"。[2](下卷 P30)

可以说利明对欧洲资本主义掠夺财富的本质看得是很清楚的, 但他对此并没有从传统儒家的"王政"立场上进行任何道义上的批判, 而是采取了首肯和推崇的态度。他赞美西欧诸强国"其国经历年数, 凡及五六千年, 故尽诸道善美, 推治道根本, 自然究国家丰饶之道理, 而建立制度也。精于算术, 故精于天文、历法、测量, 详于渡海之法则, 渡大世界之大洋者如回掌"[2](下卷 P31)。因此只要日本也同样采取殖民和贸易的政策, 终有一天也能"东有大日本岛, 西洋有英国岛, 天下大世界成两大富国、大刚国也"[1](中卷 P138)。

如上所述, 利明的思想、政策的中心是"自然治道", 而这却不是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 也不是传统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圣人之道", 而是欧罗巴诸强国采取的包括掠夺和贸易的一系列强国政策。欧洲各国"以天文• 历数算法为国王所业, 透脱天地义理以教导庶人", 因交易而"兴业", 所以"丰饶而刚强"[2](下卷 P30)。而且欧洲诸国的治道,"不以武治, 只以德治"[1](上卷 P98), 礼让甚厚, 而其精神支柱就是"以慈悲为根本"的基督教[3](P169), 所以基督教就是"自然治道", 就是"本然之理", 西洋的英雄就是传统儒家经典中治国平天下的"圣人", 就是"自然治道"的体现者和颁布者。况且神• 儒• 佛之道本来就是渊源于基督教——自然治道的, 可见利明不仅对西洋文明倍加推崇, 甚至把西洋文化奉为理想模式。

因此日本"不得真治道",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传统上追随中国思想文化,"然日本之风俗人情, 乃受支那教训影响之风俗人情, 无外求善事美事。故于不见于支那圣贤教训之四大急务, 懵懂无知"。[2](下卷 P31) 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于国务有缺有漏, 不足为龟鉴"(同上), 所以日本必须转向历史更加悠久、并发现了科学真理的西洋, 把日本重建为富强国家。

为什么日本必须从"支那"转向"西洋"呢? 这是由利明独特的"地理环境论"或者"风土史观"决定的。他认为中国是三面皆与别国接壤的山国, 不比日本是更便于发展海上交易的岛国,"且支那为接续欧罗巴、亚夫利加之山国, 虽南面一带海洋, 乃国中渡海、运送不便利之国也。以人力、牛马之力以运送, 则难养大都会之大人数, 故离海国不成大都会也。故比之周回海国包卷之日本, 乃大恶国也"。[2](下卷 P32)

而且中国从经纬度来说是"天下最良国", 寒暖适宜, 四季分明, 但正因如此"人物经历温和, 流于堕弱, 诸业诸技艺等积功者至鲜, 愚庸人多"。相反"欧罗巴之内, 有刚强丰饶高名者, 皆北边寒国"[2](下卷 P31), 这是因为寒冷国"人物皆刚强勇猛, 智慧深, 能与君长和睦, 勤守自己事业, 人情亲切, 有才学, 又长于军事"。(同上) 因此欧洲生产"自鸣钟、望远镜、测天测器、地体万国图、大洋通舶术其他种种奇功长器、药物类等", 皆"非天下万邦所及"。(同上)

那么日本能否成为与欧罗巴强国并驾齐驱的"强刚国"呢? 回答是可以的。因为日本和荷兰与英国一样, 都是岛国, 而且日本也拥有与它们同纬度的属国虾夷, 还有本属于日本的千岛和桦太, 只要把它们"开业", 再把日本的首都转移到北方寒冷的地方就可以轻易达成目的。利明这种重视北方、轻视南方的想法反映了他把欧洲列强作为机械模仿的对象, 而缺乏对西洋文化本质的理解。

利明的"自然治道"的实践者是理想中的英雄豪杰, 在实际生活中当然只能是君主和他的各级官吏。利明强调君臣都必须通时势, 才能成就大业, 所谓"君臣合体, 深知时势"。所谓时势就是以金银为中心的流通领域里商业资本抬头, 君主也不再依赖传统的地代贡租, 而是依赖商业利润, 以发展"交易"为天职。利明呼唤日本结束封建诸侯割据的状态, 建立统一国家, 并把成为实践主体的期望寄托在德川将军身上。利明并没有提出革命的理论, 这是因为在他的时代德川幕府的统治基础仍然存在, 享保改革和宽正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正是利明讴歌为"天下静谧"的相对安定时期, 学者们仍然寄希望于明君的仁政。

然而日本社会没有按照利明的设计前进, 利明死后, 内忧外患日益加深, 尊王攘夷[1] 运动兴起, 终于于 1867 年爆发了以"王政复古"为口号的明治维新, 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富国强兵政策虽然是利明当初所竭力提倡的, 但他的学说反而长时间被世人遗忘, 直到明治晚期革命与启蒙的思潮逐渐平静

---

[1] 尊王攘夷: 鼓吹天皇权威绝对化和封建的排外主义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之后，利明才逐渐受到重视。

二、利明经世论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联系

利明将文明史分为都会• 乡野• 虾夷三个阶段，而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1835—1901)在《文明论之概略》中以西洋文化为价值基准，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分为文明• 半开• 野蛮三个阶段，因此日本学术界普遍把利明看作是接受西洋文明的先驱，对福泽喻吉实学思想产生了影响等等，利明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佐藤昌介甚至认为他在体质上就与儒学格格不入。但我认为这些结论没有正确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忽视了利明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联，也就不能准确评价他在日本思想史上所处的历史位置。

在利明的时代，正值清朝的乾隆(1736—1795)• 嘉庆(1796—1820)鼎盛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虽然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但在文化方面实施怀柔笼络政策，尤其是康熙年间由朝廷主持了几项大型文化事业——编辑《四库全书》、《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在语言学、音韵学、考证学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儒学参与现实政治的色彩淡漠了，但是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儒学的政治意识在公羊学派[1] 得到继承和发展，成为清末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的革命思想。

当时清朝在综合国力上还保持着相对于日本的优势地位，日本仍然处于中国文明的边缘，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即使是像私塾这样的民间基础教育机构也是把《论语》、《千字文》等作为启蒙课程的。各个思想流派也多是中国各思想派别的翻版，就连国学[④] 也是把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学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的，可见日本思想文化几乎没有超越中国思想文化的概念范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认为利明经世学说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是中国儒学的仁政思想。

利明经世论的出发点是他认为万民增殖的趋势是“天理”，根源是“夫妇”，而这是“人伦五常”，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值得注意的是，利明的《西域物语》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初刊同刊于1798年，但利明的人口论无疑是基于儒家仁君思想的，“领国庶民无乃天民乎？——积二十年星霜而达国用，虽一国民亦宝贵也”。[2](下卷P32)。“虽禽兽无不知慈爱我子，况于人乎。……使农民饿死、亡处良田者谁之过失邪，皆应归国君之罪科。”(同上)他对领主的批判和对庶民的关注其实都不出孔孟以来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范围。

利明把以夫妇为单位的生殖活动作为“人伦五常”，说明他的学问的根基和出发点是儒学，但是也应注意到他在如何解决日益增大的人口问题上有与前人不同的地方。传统儒学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崇尚俭约，将人希望享受物质生活的欲望从“天理人欲”的观点加以根本否定。荻生徂徕对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这种禁欲主义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必须承认人的物质欲望是不断增大的这个事实，但他也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的局限，主张通过建立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调节财富的分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衣服、食物、家居，建立制度使贵人用良物，贱人用恶物，因原来贵人少，贱人多，故人少者用稀有之物，人多者用平常之物，道理相应，少无妨碍，产生于日本国中之物足以供日本国中之人使用也。”[5](二卷P313)

利明同样认识到“由有限之土地出产之产物有限，年年出产之国民年年增殖无限，国民终比国产多，国产应少于国民”[2](上卷P13页)。但他同时认识到自给自足经济的局限和外国交易的重要性，“日本为海国，尤当以渡海• 运送• 交易为国家政务之肝要”。[2](上卷P20)徂徕的主张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意识，而利明对商业活动的利益、价值是给以充分肯定的，这说明利明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进步。

以往的日本研究者通常因此认为利明是荷兰式重商主义者、早熟的开港论者，这种评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利明经世论的特点，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利明主张的是一种官营贸易论。正像他反复强调“农业是国之本”[2](后编P77)那样，他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农本主义。他对商业资本的痛恨与荻生徂徕是相通的，他也将商

---

[1] 公羊学派：清代的今文学派。最初根据今文《公羊》经说，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以《公羊》经文，发挥政见，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光绪年间，廖平分析经学，详论汉今古文学的歧异，指古学系伪造，今学为孔子自创新制。后来康有为利用今文，“托古改制”，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依据。

④ 国学：随着日本社会近世学术的发达和国家意识的觉醒，逐渐形成了通过对日本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进行文献学研究，从中发掘在儒教和佛教传来以前的日本社会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学术流派——国学。

人视为“国贼”，认为是商人牟取暴利的行为导致了武士阶级的没落，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他认为即使是欧洲商业资本也不是以赢利本身为目的，而是为了抚育人民，所以商业活动同时能为社会带来淳风美俗。“故欧罗巴诸国国王抚育万民，以渡海•运送•交易救饥寒，作为国王天职，故决无盗贼等”[2]（上卷P21）；“虽有此策（指交易），非为受利、通天下有无，乃国君之天职也”[4]。可见他对商业活动——交易的提倡并非是从赚取利润出发，而是以“抚育万民”这一政治、道德的需要为前提和目的的。这与其说属于荷兰式商业资本主义，毋宁说利明仍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儒学重农抑商的思想局限。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地方，而日本研究者几乎都没有加以深入分析，那就是利明的学问内容问题。利明的确摒弃了四书五经类伦理道德教育，而专攻算学和天文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往日本研究者都依此将他归入兰学——也就是西洋近代科学体系。但实际上算学或天文地理学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不仅并不矛盾，而且是包容、附属在传统中国文化领域里的。朱子学的“格物致知”的穷理学虽然是以论证演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为最终目的，但在历史上也经常被“歪曲”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日本朱子学派内部的一个分支——怀德堂学派也是借朱子学的“穷理”之名，树立了自己实证主义的学术主张，从这个学派里出现了好几位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正像利明自己所说“穷理学者何也，曰天地之学也。谓于是则莫有明者，其天地之学由何者可得入，其最初以由数理、推步、测量而入为近也”[1]（上卷P90）。他的自然科学其实也是与朱子学的“穷理”学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的。

在利明的时代，清朝处于鼎盛时期，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并且对于西洋自然科学并非盲目排斥，而是积极吸收其成果的。仅根据利明书中记载，16—17世纪的明末，因为《授时历》、《大统历》的不备，利马窦来华后，1629年徐光启奉旨改历。1631—1635年汤若望、罗雅各编译了《崇祯历书》。明亡后，1645年清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完成了《西洋新法历书》百卷，颁布了《时宪书》。1669年南怀仁来华，任钦天台监正。他制作了六座测量仪器，并著有《新制灵台仪象志》。1721—1722年康熙帝敕撰修成根据欧洲历法的《历象考成》，1742年乾隆帝加以修改，吸收了牛顿力学等欧洲新天文学成果。利明在文中多次对这些史实进行详细的记述，表明当时清朝在文化上仍然对日本社会发挥着影响和带动作用。正如利明所说“天文•地理•航海之法系天职，故代代改历皆天子御制也。其证据支那天子康熙•雍正二代改历，皆御制也”[1]（下卷P147），当时的日本知识界仍然习惯于把中国文化视为指南和准则，利明也不例外。

利明文中多次提到的《天经或问》一书是康熙年间福建人游艺把明末来华传教士所翻译的西洋天文书加以简单归纳介绍而成的，是欧洲天文学通俗易懂的入门书。不仅在中国知识界广泛流传，在日本也有多种注释本问世，影响很大，为当时的日本学者如新井白石、寺岛良安、西川如见、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提供了基础的天文历象学知识。

利明书中多处主张日本应该对西洋和清朝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兼收并蓄，“欲究天地之理，穷数理、推步之学后，以读西域之书，得其理为近也。若支那之书，则修大清以来天文书，推究立法术路之起源，自然明白”[2]（后编P104）。“近年欧罗巴天学传入支那，《历象考成》上编、下编、后编三书，极尽天地正论，缘此书明白天地，其后入于人事，则明白前后本末，若补入日本之未具，博用于国家要务，终将成诸道具足之大良国也。”（同上P58）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利明不仅在经世论等政治主张上仍未摆脱中国儒学的思想影响，在天文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也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三、西洋文明的挑战与利明国家意识的萌芽

综上所述，利明并非如日本学者所说从本质上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他实际上与当时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是把中国文化当作他们的思想源泉和学问基础的。但同时又必须看到，利明的时代围绕日本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已经有了质的变化，那就是西方文明的崛起对中国文明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1542年起相继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船舶漂流到日本各地海岸，而江户幕府却于1616年开始执行锁国政策，1655年开始仅对清朝与荷兰开放贸易港口，西洋文化和文明在此时期逐渐在日本得以传播，但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幕府才迫于国际形势，宣告开国，这也标志着中国文化

在日本相对于西洋文化的全面衰退。以荻生徂徕(1666—1725)为例,徂徕活跃的时期虽然随着与荷兰的贸易往来,西洋文化已经开始陆续传播到日本,但中国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徂徕对中国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不仅是当时名冠一世的中国思想家、汉文学家、中国语言学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他甚至把自己的本名物部徂徕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改成物徂徕。据称他为了能离中国更近一点,不惜在江户城中数度搬家,成为一时名谈。

利明对中国文化也是抱有共鸣和亲近感的,他甚至说"今支那国号大清,清和源氏[1]末孙故也"[2](后编P100),首先试图从民族起源上证明清朝和日本的"同文同种"。利明并且对中日文化上的相似性从地理学、气候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他认为日本从纬度上看,"寒暑等分,气候最良也。支那气候亦殆与日本相等也。——北极高度相等故,土人风情自然相等,故书籍意趣亦与人人胸中相应"。[1](上卷P91)

不过利明虽然也承认中日文化上的近亲性,但在西洋文化面前,他认为中日文化都是劣等的,对这一点他又是根据他的地理学理论进行说明的。他把世界单纯地分为寒国和暖国,认为民族优劣的差别是由于食物的不同造成的。日本和中国属于暖国,以米为主食,次食植物,稍食动物;而寒国(西洋诸国)多食肉、油,次食蔬果。暖国的食物造就温和、惰弱的国民性格,而寒国食物则培养勇敢、智慧的气风。住居条件也与此相对照,欧洲多石造,所以人民智慧通达;日本多木造,所以人民愚钝淡漠。

利明在把西洋理想化的时候,也是着眼于其科学技术方面,而不触及生死和信仰等精神文化,可以说他的自然治道就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利明对儒学、佛教、神道和基督教的评价都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基于对那种教义的思想上的理解出发的。同样他说的"理"也不是传统上的哲学的思辨,而是自然科学的概念。至于作为"理"的体现者、实践者的"圣人",则"东方天竺亦出释迦,支那出尧、舜、禹、汤、文、武圣王——不过各说治国平天下之法——约之皆不过劝善惩恶之意"[2](下卷P29);"有神•儒•佛三道行于世,然兴益于国家之英雄不出,似无三道信用之验"[1](上卷P97);"埃及文明、犹太天主教、天竺释迦及支那诸圣人垂训——虽其所说各异,不过各说治国平天下之法"[2](下卷P29)。也就是说,传统的治国平天下之法和劝善惩恶都已于"国家丰饶策"无补,代替圣人的新"英雄•豪杰"必须"才•德•能"兼备,为了"渡海、运送、交易",必须掌握天文、地理、海洋涉渡之道。而统治者的典型比如"荷兰国开祖"、女帝叶卡德琳娜二世等,其被评为"大德"之人也主要是从治理国家的实绩来判断的。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社会内部国学的兴起和西洋文明的挑战,使利明萌发了初步的国家意识,时时强调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尊严。"支那南西至东京、交趾、占城,东至朝鲜皆领分也,仅日本曾不属。海路仅不过二百五、六十里,虽曰小国,依神武吹训,故至今无被侵掠事也。"[2](后编P101)

他认为中国文明历时3800年,日本历时1500年,西洋自埃及文明以来已有六千余年,所以日本必须停止对中国文明的模仿,充分尊重本民族的固有传统,"与其日本悉皆模写支那故事,达国用得益,毋宁取我邦自然具足之益简捷"[2](下卷P29)。在有所不足的情况下,追随更加先进的西洋文明。"支那、日本国初以来,经历年数比之西域,尚未至半。西域既为旧国,世务国务皆已整备,取西域美善之事,为我国之助者乃本意也。"[2](后编P106)

不仅在社会制度方面,在文化上利明也是通过把西洋理想化的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支那立人道去今三千余年,比埃及迟者三千余年,然于国务漏缺众多。且支那文字字数多,不便国用,难与外国通,仅通用朝鲜•琉球•日本三国,虽于亚细亚洲内三、四国通用,其真意难得解也。欧罗巴国字数二十五,连异体有八品,足记天下事。最以简省。"[2](后编P104)。"达支那国字,得博学之名,不如用我日本假名文字,尽其情味便利也。"(同上页)

从利明身上可以看出,由于当时中国相对于西洋的衰退,使原处于中国文明边缘的日本不再甘心于充当中国文化的附庸,这种文化上的反思同时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

[1] 清和源氏:日本平安中期的著名武将源经基(1016—1097)。

旧来的经世家们都受到幕藩体制[1]的影响和局限，以藩为单位阐述各自的经世主张。而利明与同时代的其他重商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超越了“藩”单位，着眼于日本全国，显露出“统一国家”的萌芽意识，“檟生于日本者，谁不为国家而思计乎?”[2](上卷P12)利明把日本看作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国家，是一大进步。他怀着日本与诸列强并驾齐驱的强烈期待，把实现“自然治道”的希望寄托在幕府将军身上，“为事皆上仰君大慈降旨，不稍出我意，万事敬谨，不差为臣之道，日日归美于君，信向方内，事无不成就，是兴业大概也”[1](中卷P131)。但是明治维新表明日本社会后来关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构想占了上风，利明虽然也肯定了皇室在道义上和文化上的意义，但他只承认德川幕府的权力体制，这大概也是主张富国强兵的利明在明治时代反而一直受到冷落的一个原因吧。

利明对北方领土有着特殊的关注，“属岛开业”指的就是小笠原等日本周边诸岛的开发，主要目标是虾夷地。利明自号北夷，文中关于虾夷的记述虽被指出非直接观察结果，多系间接知识，但也足见其关心程度。

利明认为虾夷目前虽然还是未开的蛮荒之地，但最终可以开发为“大良国”，这是由纬度决定的，因为“以北极高度可知土地之寒暖，五谷百果之丰熟不熟，乃开业第一证据也”。从这种简单朴素的环境决定论出发，他得出了日本必须摆脱中国文明的影响，转而接受西洋价值体系的结论。“日本与支那有异，既为海国，须具足国土相应之职业，此系国君天职也。”[1](中卷P 114)”也就是说从支那到西洋的转变主要是从地理位置即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角度考虑，而日本成为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的可能性也正在于此。况且从气候学的角度讲，日本虽然纬度较低，但国土狭长，只要把首都迁到高纬度寒冷的北方，就可以弥补这个先天不足了。

日本学者认为利明对北方问题的关注不同于以往侧重于海防、武备的角度，而是主张交易、开业等和平的对策，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和平的殖民主义者。但是利明记述同为重商主义国家的英国为了夺回对日贸易权，曾经发动了对荷兰的战争(1784—1786年天明年间)，对此利明发表评论说“虽历战争，为国益而谋者君道深秘也，国家守护之本业也。此道在理，故外国以交易为国家守护之本业，则交易之道协乎合战之道，攻取外国，以为所领”[3](P182)，主张和平交易的利明的学说当中其实潜伏着向战争扩张主义转变的倾向。日本研究者认为利明的被遗忘是因为以暴力手段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明治政府无法采纳他的和平主义主张，所以他的曾经受冷落反而证明了他的学说在那个时代的先进性，但是我认为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通过以上对利明思想学说的分析，可以看到利明其实是日本从支那到西洋的一个短暂的过渡，而对日本人的这一段心路历程，日本学者没有加以深入的分析。其实利明颇为典型地反映了那个阶段的日本人怎样努力挣脱中国文明的影响，萌发了关于独立完整统一的国家意识，又怎样努力投向另一个文明的中心——西洋。同时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和显而易见的，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或西洋文化都没有受到原理上或本质上的分析和批判，仅仅是从一种机械的实用主义出发，日本就“顺利”地完成了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这与背负着沉重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路程上步履维艰的中国形成了引人深思的鲜明对照。

[参 考 文 献]

[1]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A]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M].岩波书店,1970.

[2]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A]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M].岩波书店,1970.

[3] 本多利明.交易论[A]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M].岩波书店,1970.

[4] 本多利明.西藏事情[A]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M].岩波书店,1970.

[5] 荻生徂徕.政谈[A]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徕[M].岩波书店,1970.

[6] 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研究[M].东京大学出版会,1951年.

[7] 冢谷晃弘.江户后期经世家的两个类型——本多利明和海保青陵[A].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解说[M].岩波书店,1970.

[8] 冢谷晃弘.本多利明[M].岩波书店,1970.

---

[1] 幕藩体制:近世日本社会政治体制。德川幕府作为最高领主，将各地土地和农民分封各个诸侯大名，在自己的领国——藩的内部，大名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但必须服从幕府的命令。

[9] 福泽喻吉. 文明论之概略[M]. 岩波文库, 1989.
[10] 佐藤昌介. 洋学 史研究序说[M]. 岩波书店, 1964.
[11] 黑住真. 儒学与近世日 本社会[A]. 日 本通史 13 近世 3 文化论[M]. 岩波书店, 1994.
[12] 渡边浩. 近世日 本社会与宋学[M]. 东 京大学出版会, 1985.
[13] 金谷治等编. 日 本名著 16• 荻生徂徕[M]. 中央公论社, 1974.
[14] 田原嗣郎. 徂徕学的世界[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1 年.

(责任编辑　　真漫亚)

From China to the West: On Modern Japanese Thinker Liming

WANG 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Liming is the most unique political economist in Japan's late *Jianghu* period. He urged Japan to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to adopt instea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lthough his theories of social order in particular can be traced back to Confucianism, he has been heralded as the pioneering theorist who effected the paradigm shift in Japan's orientation from traditional China to the modern West, first influencing Jap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lue system and ultimately Japanese society as a whole.

Key words: Liming; *Jianghu* period; political economist; Western learning; Confucianism